



中西方叙事中的“家”与“个体”

——孙向晨教授在文化治理现代化高端学术系列讲座的演讲

思想者小传



孙向晨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教授,主要研究以霍布斯、卢梭、黑格尔等人为代表的近代政治哲学,近年来致力于中国传统思想现代阐释的研究。

近代以来,如何来理解“家”逐渐成为一个个颇具挑战性的话题。在中国,大多数人讲到“家”感觉有点复杂。

一方面,大家对“家”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情感,我们也习惯于从“天下一家”的方式来理解整个世界,包括国家、家园、大家。

另一方面,在现代世界讲“家”,似乎又有一种沉重感、遥远感。有一次,我做讲座,有听众甚至认为“家”这个话题太过陈腐。

五四运动以来,一些文学作品对“家”的印象也是负面的。在《家》《春》《秋》中,长子长孙要支撑起整个家族,于是觉新就要牺牲自己的个性、爱情甚至妻子的生命。这与现代社会尊重个体、张扬个性的主张背道而驰,因此激起了同时代人极大的同情。

不过,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如梁漱溟、钱穆以及后来的新儒家唐君毅、徐复观等人,也从不同的角度来积极捍卫传统对于“家”、“孝”的看法。

近代西方哲学在建立个体哲学的同时,有另外一条暗的线索,那就是不断瓦解“家”的概念,其目的就是服务于现代社会所强调的个体平等、消解“家庭”所带来的不平等的自然权力。这一策略对西方哲学有很大的影响,关键之处在于确立了近代以“个体”为主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家”在哲学层面逐渐隐退。

在哲学领域,哲学家们热烈讨论人类、国家、社会、各种组织或共同体,涉及每一个人生活的“家”却在哲学中难觅踪迹。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哲学是对生活本身的反思与观照,所有的对象都应该在哲学反思的视野之下。

本版稿件选自上观新闻“思想汇”栏目
栏目主编王珍邮箱:shhgcsxh@163.com

以“尊重个体独立自主之人格”,来呼唤新的时代来临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胡适、傅斯年、鲁迅、周建人等人写过大量文章来讨论个体与家庭、个性与家庭,讨论家庭的压抑与个性的解放。

傅斯年写了篇文章叫《万恶之源》,认为“家”是万恶之源;吴虞写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认为“家”是中国专制主义的基础……这一时期,“家”大致被定下了这样一个基调:“家”是对个体的压抑、束缚以及禁锢。这是一种非常负面的看法。

无独有偶,在西方近代哲学中,同样有一

种强烈的“反家”传统。西方社会固然有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传统,但很长一段时间里世俗社会依然是等级制的、封建制的。一旦论述人是平等自由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敌人就是“家庭”,因为家庭中包含着自然权力的不平等。

新文化运动突出“个体”的立场不是毫无根据的。1916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开篇辞中,就以“尊重个体独立自主之人格,毋为他人之附属品”来呼唤新的时代来临。

“个体”看上去是一个西方化的概念。人们经常讲,中国文化重视“家庭”,西方文化重视“个

体”。其实,细究起来,西方传统上也不怎么重视“个体”。如果去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书,就会发现他们讲的是城邦,强调人是城邦的动物。这类似于印度文化中的村社、中国的家族。

传统世界中,人都是在整体之中生存的。“个体”作为一个概念,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现代概念。道理很简单:当一个社会的供应不够充足的时候,个体的人类是很难生存的,人类社会只能以整体的方式延续。进入现代社会,每一个个体都会被凸显出来,每一个个体的生命、价值都得到了更多的尊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国家

加入联合国,自然要认同《世界人权宣言》。这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门槛,它之于现代人的解放与创造具有重大意义。

但是,如果细究“个体—主体”的概念,会发现其中还存在一些缺陷:个体似乎并不那么自足,以个体为基础的个体性哲学时不显得捉襟见肘。

主体性哲学有所欠缺的,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他者”的缺席。20世纪“他者”哲学的兴起,显然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对主体性哲学欠缺的透彻反省。

“他人”不是被排斥的他者,而是可依恋依靠的“亲人”

对于这种欠缺,更强烈的、更能触动我们的感受可能来自文学。

17、18世纪的文学中,个体似乎都是自信满满的——“我”是主体,有自己的权利,要摆脱束缚,要去奋斗,等等。但到了19世纪下半叶,社会中似乎充满了孤独感、飘零感乃至荒谬感,如加缪和卡夫卡的小说。

在西方传统中,一直有弥补这一欠缺的传统。柏拉图讲过一个故事,说人原来是一个整体,然后把整体的人一分为二,就有了男人和女人。这当然是神话,表达的意思却很明确:单纯的个体有其不够完整的方面,因此

总是追求那个欠缺的部分。但在中国的传统里,有很不一样的抚慰个体的路径,即更多强调“亲亲”。

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我们会强烈地感受到亲情,甚至会将这种亲情泛化,成为整个城市、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之间的联系。无论是《中庸》还是《孟子》里,都会说“亲情为大”,这就是把一种情感泛化为哲学和文化的概念。

所谓“亲亲”,是指一个人生命中最初遇到的那个“他人”不是西方哲学中那个陌生的、外在的、被排斥的他者,而是可以依恋、可以依靠的“亲人”。基于这一点,中国文化形成了一个完整

的整体。这种差异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让我们讨论“家”的哲学有了一个巨大的空间。

比如,古埃及文明通过制作木乃伊来追求某种不朽,而儒家思想强调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希望通过生生不息、世代相连来表达生命的不朽。后者是一种非常质朴的对生命的延展,没有任何超越自然的奢求。

在这种生命的延续中,最主要的情感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亲”。由此,中国文化讲求“亲亲”,然后是“孝悌”“仁爱”。从这种最质朴、最基础、最自然的情感中发展出一个基本德行,人们将其称之为“孝”。

这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是很难得到理解的。在他们看来,父母和子女之间是一种自然情感,谈不上德行。可中国人看这个“孝”字,上面是一个“老”,下面是一个“子”。通过“孝”这样一种德行,就将两个世代紧密连接了起来。

当然,这还不够。所以,孔子讲仁爱、讲仁者爱人,孟子讲仁民、讲爱物,逐步将这一情感推广出来,最后达至泛爱众生、泛爱天下的概念。

这样一个概念,不是从单纯的个体、自我出发,而是以人与人相互之间的亲情作为基点。这就是中国文明逐渐发展出来的理解世界、理解生命的一种基本态势。

强调个体的自由权利尊严,制衡“亲亲”带来的局限性

套用马丁·路德所说的“因信称义”,中国文化是“因孝称义”。对由“亲亲”而来的“孝”的重视,是盘活中国文化的一个枢纽点、核心点。

2019年下半年,我在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讲授中国哲学。当讲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时候,外国学生普遍受到震动。这样一个清晰的、对人类社会非常普遍的存在论事实,却是他们此前从来没有认真想过的。在西方社会中,人们但凡想到人,似乎都只是“个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一生存论基本事实完全成了盲点。

尽管如此强调“亲亲”,但我们也必须承

认:在现代社会里,“个体”有着非常积极的一面。不过,单纯讲“个体”也是有一定问题的。“现代病”中的消极、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等,都与过于强调个体有关。就像讲到“家”,其实也是两种情感,一种是亲切的、温暖的,一种是血腥的、狭隘的、威权的。

现代社会对权利、平等、自由、价值、尊严是有高度认同的,没有人会觉得自己生来比别人低一等。但同时,没有和谐家庭支撑的“个体”也会发生各种偏差,因此就需要我们的一些传统文化资源来支撑、发扬。

有人质疑,中国人讲推己及人,但好像只能

“推”到自己人。传统文化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那就是通过教化来克服这种狭隘性。

举个例子,儒家特别强调“爱有等差”,但又特别强调“推己及人”。这里的“推及”特别重要,它可以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亲亲”一直推及“民胞物与”,也就是泛爱天下。但这个爱是等差的,也就是爱的推及过程是一个不断递减的过程。解决这一问题,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通过教育来不断地扩大、扩充仁爱。

同样是对仁爱的分析,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对“爱有等差”就给出了另外的方案。他们认为“爱有等差”,因此要有一种人为的德行——正

义,也就是法律,来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以此来弥补仁爱这种自然德行的缺失。这是不同的历史、文化给出的不同路径。

今天,我们在面对“亲亲”这个问题的时候,除了中国传统的路径有其意义之外,还可以通过强调个体的自由、权利和尊严,在“家”的文化中植入现代性的内容,从而建立起一套公开、公平的体系来保护每一个人,并在获得传统文化的滋养的同时,制衡“亲亲”所带来的局限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个体”与“亲亲”完全可以相互结合,而并不如我们想象的是一种相互排斥、相互冲突的关系。

通过世代延续的方式,就有了健全个体的“向生而生”

对于“家”的理解,可以是多方位的,可以是社会性的,也可以是伦理性的。我个人更强调“家”的结构性和精神性层面。

哲学家海德格尔有一个著名的论述,即人是一种“向死而在”,即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都必须面对死亡。因此,人类生存的普遍感受就是焦虑。

但基于“亲亲”之爱,我们的生存就有另外一个面向——“向生而生”。我们的生存不仅面向死亡,还面对着下一代。通过成语“愚公移山”可以发现,中国人对整个生命的理解,不仅局限在作为个体的一生,还会通过世代延续的

方式,对生存产生希望。这是一种文化,是将孩子当作生命的未来、生命的延展的一种文化。

举个例子,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骆家辉,他的故事如果按照美国文化来讲,就是一个少数族裔进入主流社会,不断自我奋斗、自我实现的故事。但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这个故事就不一样了:骆家辉的爷爷从广东移民至美国,开始在一个富人家做仆人,赚钱让自己的子女接受教育,最终他的孙子成了美国主流社会中的一员。

在西方主流叙事中,他永远是个体;而在中国传统叙事里,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世代之中,个

体的成功有时候并不只是靠个人,而要通过一代代人积累才能达成梦想。在这样的梦想背后,“家”营造出来了不一样的生存结构。

这样一种结构不仅与西方传统有不一样的生命观,也形成了不一样的世界观。

从古希腊传统开始,西方建立起追求“同一”的哲学立场。从泰勒斯说“水”是万物的始基,一直到黑格尔的“绝对”,西方哲学的主流都是在寻求一种总括性的概念,把世界的一切包容进去。这似乎成了哲学的本性。而就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对于“同一”的传统是拒斥的,孔子就讲“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同”。

某种意义上,“亲亲”所建立的“家”的概念,处在“同一”与“他者”之间。“亲亲”是在不同人之间发生的,不是“同一”所能涵盖的,但“亲亲”所面对的“他者”也并不是完全陌生的、排斥的,而是一个可以亲近的他人。由此,我们才有“四海一家”的说法;由此,这个世界才是温暖的。

事实上,人类除了有自律的、抽象的、理性的方面之外,每个个体都有脆弱的地方,都有情感依恋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社会依然要发挥这种“亲亲”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精神分析所描绘的“紧张个体”,才能有一个健全个体的成长。

解新日报 消费市场 专版

刊登内容

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
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
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
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
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

电话: 021-22898598

革命志士的避难所

宋庆龄 与 路易·艾黎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编著

路易·艾黎的住所也经常被他用作地下党员、革命志士的避难居地,实际上他的住所成了一个秘密据点。有时候,史沫特莱会带来一个中国人,在艾黎家住上几天。为保密起见,这些中国人都会带有一个外国名字,甘霖和艾黎也不会去打听他们的真实姓名。有一次,艾黎家来了一位眼睛近视的中国教授和他的夫人。几天后,史沫特莱让艾黎领他们登上了一艘即将启航的轮船。为了更好地伪装,那位教授摘掉了眼镜,打扮成上海滩的阔佬,身穿白上衣和短裤、长袜,还戴了顶时尚的软木遮阳帽。尽管高度近视,教授却要装得若无其事,在艾黎的陪同下神情自如地从包探身边走过,安全地上了轮船。后来,路易·艾黎才知道,这位教授就是著名学者、中共党员陈翰笙。1938年前,在路易·艾黎寓所居住过的革命者还有李克农、饶漱石、许光达,以及日本友人鹿地亘和池田幸子夫妇。

1935年秋天,史沫特莱安排一位周先生入住路易·艾黎家。这位周先生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曾经在德国、苏联留过学,还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讲过课,因此艾黎叫他“周教授”,还为他取了更感亲切的外国名字——查尔斯。其实,那位周先生就是曾经在上海中央特科从事情报调查工作的刘鼎。1931年10月,刘鼎因叛徒出卖被捕,后经组织营救出狱。1933年,刘鼎任闽浙赣苏区政治部组织部长、红军分校政委、兵工厂政委,亲手研制并组织生产了红军第一门火炮,开创了我国早期兵工事业。

1935年5月,他在转移途中遭敌军伏击被捕,羁押在九江俘虏营,后趁乱逃出营区,乘船秘密潜回上海。

1935年12月,在“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影响下,上海各界民众掀起抗日救亡热潮。国民党政府被爱国运动搞得神经紧张,到处搜捕革命者,风声越来越紧。艾黎听说当局要搜查他的寓所,为了刘鼎的安全,艾黎和史沫特莱、甘霖商量后,决定把刘鼎送到莫利爱路宋庆龄家里躲避几天。

1936年,中国政治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早在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率先响应,开始为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积极奔走出力。与此同时,国民党上层也希望通过各种渠道“打通共产党的关系”,宋子文奉命找到宋庆龄,将愿意谈判的消息传递给中共方面。经过认真考虑,宋庆龄委托以牧师身份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前往陕北向党中央传递消息。1936年3月,董健吾回到上海,向宋庆龄汇报陕北之

行,转交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的复函和林伯渠的亲笔信,以及三枚江苏铸造的刻有镰刀斧头图案的银币和一套布币。此时,刘鼎因孤身脱险回到上海,已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不久,史沫特莱来告诉刘鼎,有位朋友想要见他。原来,被蒋介石派往陕北“剿共”的张学良将军秘密派原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李杜来上海,希望能与中共方面建立联系。宋庆龄认为,刘鼎最适合代表中共去张学良那里,还可以让张学良帮助刘鼎去陕北,于是安排董健吾与刘鼎接洽。

刘鼎为西安之行做了充分准备,他花了十多天研读相关报刊和党内文件,提前了解张学良个人经历、处事特征。临走前的那几天,路易·艾黎等人都想着怎样为他送行,并通过他给陕北那些为了正义事业而奋斗的人们带点什么,表达大家反对法西斯、支持中国革命的心愿。史沫特莱把她家的桌布、窗帘、床罩、毛毯、衣物等装了满满一大箱,托刘鼎捎给陕北红军。听说红军医院缺少药品,她还特意准备了一大瓶麻醉药之醚,这在当时是很珍贵的医用药物。甘霖送给刘鼎一套小型工

具,钳子、改锥、扳手、锤子、刀具、千分尺、卷尺等,应有尽有。刘鼎把这套工具中的锤子头打下来,把宋庆龄托他转给中共中央的密信塞进锤子把内,又用钳子扳牢锤子头。艾黎专门去南京路为他置办一身体面的行头,经过打扮,刘鼎俨然是一位刚从国外归来的大学者。与此同时,延安传来消息,需要派一位进步记者和一位医生到陕北去。宋庆龄推荐了艾黎的好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大夫,他们将和刘鼎同行,由西安进入陕北苏区。

此后,路易·艾黎和史沫特莱就承担了在上海为陕北红军购买医药和其他供应品的任务。他们想了许多办法从药店买来大批药品,然后发往西安,由刘鼎转给红军。为了能公开接收这些物品,刘鼎请史沫特莱找到一位从德国流亡到上海的犹太医生海伯特·温奇博士,在西安七贤庄设立了一家牙科诊所。实际上这是刘鼎建立的秘密联络站,也是许多革命者进入陕北的中转站,全国抗战爆发后这里就成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1936年9月间,刘鼎委托艾黎把红军东征缴获的巨额山西省银行钞票兑换成通用的法币。艾黎带着这些钞票从西安来到太原,凭着他那显眼的黄头、大鼻子、蓝眼睛,机智地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把钱带回了上海,交由马克思·格兰尼奇等朋友处理。后来,宋庆龄将钱款凑满1万元,通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章乃器电汇给刘鼎。这笔钱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刘鼎用此款为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很多工作。

1934年1月,由美国记者伊罗生负责编辑的《中国论坛》杂志停刊。这本创刊于1932年1月的红色进步刊物,是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创办和资助,宋庆龄与伊罗生具体负责领导的。

(十一) 连载